



分析心理学创始人：
卡尔·荣格传

CARL JUNG

Paul Bishop

[英] 保罗·比舍普 著
朱晓映 译



分析心理学创始人： 卡尔·荣格传

CARL JUNG

Paul Bishop

[英] 保罗·比舍普 著
朱晓映 译

黑版贸审字 08-2017-124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分析心理学创始人：卡尔·荣格传 / (英) 保罗·比舍普著；朱晓映译。

—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5316-9641-4

I. ①分… II. ①保… ②朱… III. ①荣格 (Jung,
Carl Gustav 1875—1961) —传记 IV. ①K835.2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54841 号

Carl Jung by Paul Bishop was first published by Reaktion Books, London, UK, 2012, in the
Critical Lives series

Copyright © Paul Bishop 2012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7 by Heilongjiang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CA-Link International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分析心理学创始人：卡尔·荣格传

FENXI XINLIXUE CHUANGSHI REN: KAER · RONGGE ZHUAN

丛书策划 宋舒白
作者 [英] 保罗·比舍普
译者 朱晓映
选题策划 王毅
责任编辑 田洁
装帧设计 冯军辉
责任校对 张爱华

出版发行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 158 号)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新 浪 微 博 <http://weibo.com/longjiaoshe>

公 众 微 信 heilongjiangjiaoyu

天 猫 店 <https://hljjycbsts.tmall.com>

E - m a i l heilongjiangjiaoyu@126.com

电 话 010—64187564

开 本 700×1000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38千
版 次 2018年2月第1版 2018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16-9641-4
定 价 48.00 元



卡尔·荣格，1960年

以此纪念罗伯特·柯里（1940—2012年）

神说一次、两次，世人却不理会。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神就用梦和夜间的异象，开通他们的耳朵，将当受的教训印在他们心上，好叫人不从自己的谋算，不行骄傲的事；拦阻人不陷于坑里，不死在刀下。

——《约伯记》(33:14—18)

只有回首过去才能引领我们前行，一味向前只会让我们落后。

——诺瓦利斯《片言只语》

序

Preface

传记作为诗与真理

为任何一位重要的思想家写“评述”似乎都是一种冒险，而当“评述”对象是一位心理学家时则更可能险象环生。这就如同我们在餐桌上或者乘火车长途旅行时，发现邻坐竟然是一位心理分析师时会感到有些不知所措一样，你不会愿意去推测一个心理分析师的内心，因为，毕竟他就是以推测别人内心里的欲望和理想为职业的。

为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写评传也遇到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同样也曾在荣格自传《回忆·梦·思考》中出现：“我不想也不能跳出自我，以一种绝对客观的方式去观察自己的命运。”

然而，撰写传记虽难却并没有让作家们望而却步。《回忆·梦·思考》——其中一些素材由荣格自己提供——可以看作与其他一些杰出的传记作品一脉相承的，如圣奥古斯丁（公元4世纪）的《忏悔录》、让-雅克·卢梭的《忏悔录》（公元18世纪）、本韦努托·切利尼的生平故事（写于1570年，1728年出版）、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传记（1791年出版）、卡萨诺瓦的传记（1826年出版），或者与荣格的语言文化背景更近一点的，歌德的自传《诗与真》以及尼采自传《瞧，这个人》等。

回忆·梦·思考

《回忆·梦·思考》一书的作者是卡尔·古斯塔夫·荣格，编辑是安妮拉·贾非（Aniela Jaffé）。作品开篇便呈现出一种神话创作的特质。在书的序言中，我们被带入了这样一个情境，想象着83岁高龄的荣格，坐在那里，讲述着他的“个人神话”。书中提醒我们，荣格只是“讲故事”，故事是否“真实”并不是问题。“唯一的问题是：我所讲述的是否是我的寓言，我的真理。”换句话说，荣格或许是想问：我所讲的是不是我的诗歌，我的真理？也许，荣格的话旨在回应歌德那题为“座右铭”的箴言：

我告诉你的，是真理，只是真理，当然：
 是我的真理，因为除了真理，我一无所知。

在《回忆·梦·思考》中，事实准确性的标准被存在真实性所取代。我们从中将会了解的只是那些“值得讲述的事件”——是那些“永恒世界骤变成短暂世界”的瞬间。因此，文中所讲述的那些瞬间，是“内在的经历”，是构成荣格的科学作品《原质》（*Urstoff*）的“原始素材”。这些经历像“火热的岩浆，在各种作用下，从岩石中流淌出来，凝结成晶体”。作品一开始所呈现的“永恒”和“暂时”的对立使我们想起歌德的一句格言，它颠覆了传统的（柏拉图的）秩序，并将“暂时”置于“永恒”之上：

我为那些纠结世事无常、沉湎于尘世浮华而迷失自我的人感到十分遗憾。毕竟，我们存在的目的是让暂时变成永恒；

但是，只有当人们领悟到暂时与永恒的真谛时，暂时才能成为永恒。

这个观点在歌德的《韵体诗》(*Zahme Xenien*)的第一节中反复出现：“过去什么也没留下 / 无论过去经历了什么！ / 让我们自己变成永恒 / 这就是我们存在的意义。”

因此，写荣格评传，从某种意义上说，借用歌德的一句话，就是观察并思考荣格是怎么“让他自己成为永恒”的。或者，换句话说，即去审视为何荣格至今依然那么重要。已经有很多本介绍荣格生平和思想的书了，为什么还要写这一本？因为荣格的价值一直在发展和变化，也就是说，人们对其价值的认识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歌德在《形态学总览》(*Observation on Morphology in General*)一文中曾指出，形态学包括“构成形态的原则以及有机体的形成与变化”。他认为，这个定义的新颖之处在于它不仅提出了形态学研究的“对象”，还提出了“目标和方法”。歌德在文中“目的阐述”的部分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德语中常用一个词来形容物理有机体的复杂性，即‘结构形态’”。“但是”，他继续说，“如果我们观察这些形态，尤其是那些有机形态，我们会发现，其中没有什么是永恒的，没有什么是处于休止状态的、是固定不变的——所有的一切都处于一种不断变化的运动中”。“这就是为什么，”歌德总结说，德语中“频繁而又妥当地使用‘教化’这个词——意思是‘形成’‘构成’，在另一些语境中，也有‘教育’的内涵——来‘描述最终产品的样子以及在产品形成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

《回忆·梦·思考》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呈现发生与发展的过程，就像传记作品要有问题意识一样。不同的文本应该要突显其自身的专长。因此，在《回忆·梦·思考》中，荣格的生平不只是以

“故事”的形式来呈现，而是作为一种特别的故事来讲述——“无意识的自我实现的故事”。不仅如此，在这里所被感知到的那些无意识是动态的，个人被认为从本质上是变化的事物、正在变化和已经变化的事物。我们读到这样的话：“无意识中的一切都在努力寻找外在展示的机会”——或者用德语中的原文，他们努力变成真实的东西——因此，“人格”（这个词在这里是荣格的术语）“需要从无意识的情境中走出，或者去展示它自己，去完整地经历”^①。然而，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我们需要一种特殊的话语，科学话语不足以去完成这个任务，因为荣格“不是以一个科学的问题去经历他的生命”，任何人都不是如此。

那么，除了科学话语还有什么话语方式呢？如果不能用科学话语去完成这个任务的话——或者从严格意义上说，那是一种历史的、“传记的”话语——我们还可以用其他什么样的话语工具呢？对于荣格而言，科学或者逻辑有另一种替代品，称为“神话”，但是留意一下“神话”概念是怎么来的会很有趣。神话中所呈现的不只是虚构的或者宗教的故事，而是表达“人的内在视野”的一种方式，表明“人的永恒视角”。这里的两个表述中，一个是另一个的注释。“内在视野”是从永恒的角度去审视个体，而“永恒视角”可以通过“内在视野”实现。更准确一点说，“永恒视角”因被荷兰哲学家巴洛克·德·斯宾诺莎在他的著作《伦理学》中使用而出名，他在书中提出了“第三种知识”的概念，他也将其称为“直观知识”^②。在《回忆·梦·思考》一书后来的章节中，这些主题得到回应。我们从中获知，个体最为关键

^① 在英语中，“个性”这个单词常和名流文化及虚荣崇拜联系在一起，已经变得贬义（例如短语“电视个性”）。荣格使用这个词暗指一种功能、意识和无意识的集合（详见《个性的发展》）。

^② 斯宾诺莎：《伦理学》（*Ethic*），1677年，第5部分第29和30个命题，《斯宾诺莎选集》，约翰·王尔德编辑，伦敦，1928年，第387—388页。弗洛伊德在他的《论心理分析运动的历史》（1914）一文中调侃地使用了这个术语。《弗洛伊德选集》，第14卷，第58页。《伦理学》第5部分中第25个命题，《斯宾诺莎选集》，第385页。

的问题是：你是否与某种无限有关？斯宾诺莎在《伦理学》中的另一个章节中告诉我们——我们确实也有体验——我们就是永恒。

“神话”就是用来表达人生的这种永恒维度的，它也催生了一种特殊的话语策略。荣格采用“讲述”他的“个人神话”的策略，或“直接陈述”，或“叙述故事”。这些故事是真的吗？对于荣格而言（荣格的追随者也这么认为，学者和历史学家们可能不这么看），故事真假与否并不重要。而重要的是，故事存在的有效性是什么。那些被讲述的故事是不是荣格的故事：是不是他的“寓言”？是不是他的“真理”？

为了说明这种永恒维度是生命的精髓——这也是活力论者的永恒维度——荣格用了一个非常准确而又鲜明的意象：根茎。什么是根茎？任何一个有经验的园林工人都能解释，根茎是直立生长的植物茎秆儿，常常（但并不总是）延伸到地下，上面长着多个结节，从结节里长出根须或者嫩枝。后来也有一些思想家，著名的有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菲利克斯·瓜塔里（Félix Guattari），用“根茎”一词代替“根”的逻辑概念——在他们看来——“根茎”与“根”是一回事，将后现代方法的水平状态与古典形而上学中的垂直状态相对立。所以，我们毫不惊讶地发现，正像克里斯琴·克里斯莱克（Christian Kerslake）所说的那样，德勒兹早年就是荣格的读者和评论者。

在《回忆·梦·思考》中有一段关于植物修辞的华丽描述，其中“生命”被比作“靠根茎生存的植物”，如同“真实的生命是不可见的，是藏在根茎中的”。因此，“露在地面上的那部分只能存活一个夏天”，然后，“枯萎——像一个短暂的幻影”（就像赞美诗作者感叹，人生如花似草，枯荣有时；用著名的《圣经》中的话说，即“所有的肉体都是草”）。对于个体来说真实的东西，对于文明史来说也是真实

的。在《回忆·梦·思考》中，荣格给我们以“无用之人”的印象，整天思考着那些没完没了的关于生活与文化形成又消失的现象。然而，有一些隐藏的东西一直都在，在永恒变动之下，某种东西一直存活者，这种东西一直都在荣格的作品中。对荣格来说，能够持久不衰的东西都是他称为古色古香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荣格的地位突出是有道理的，就像狄尔泰所言：“现状从来就不是我们所看见的样子，我们所经历的现状中总是包含着对刚经历的过去记忆。”

荣格后来写的文章回到了根茎的意象。1937年，他到耶鲁大学演讲，题目是《心理学与宗教》(*Psychology and Religion*)。他在演讲中说：“根茎的样子就像是地上的枝，但是植物的主干是在地下延伸的根茎”，正是这种根茎“代表了植物的神经系统”，它们与“由情结、症状和梦所组成的矩阵”一样重要。在《转变的象征》(*Symbols of Transformation*)一书的前言中〔这是他的第一本主要著作《力比多的转变和象征》(*Transformations and Symbols of the Libido*)的修订版〕，荣格写道：“个人意识只是季节的花朵和果实，是从地下不断生长的根茎中萌发出来的。”因此，他指出：“如果考虑到根茎的存在，植物与真理则更相配。”或者，换句话说，如果需要将其视为永恒的形式。因为，正像荣格在文中所写，他引用了《道德经》第52章中的一句话“根的问题是关系到所有问题的母体”。在《回忆·梦·思考》中，荣格早年的记忆被描述成“像一根茎上的枝芽，也像是无意识发展的路上的车站”。

在荣格的写作中，根茎意象的内涵是一个永远的主题——也是对于灵魂永恒维度的探究。1927年，荣格在卡尔斯鲁厄演讲，后来，那个讲演稿以《分析心理学与“世界观”》(*Analytical Psychology and “Weltanschauung”*)为题发表。在这篇讲演中，他将分析心理学看作对抗被放大了的意识理性的一种反应，其目的就是“努力呈现反应的

过程，将其从大自然中分离出来”——尽管在荣格看来，这样做也未见得好，但这样也就将人类从自然历史中分离出来。当我们被从自然历史中滤出的时候会有什么感受，荣格描述那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像蹦极一样的压迫感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希望与承诺。他的心理学致力帮我们从中解脱。

1932年，荣格参加了在斯特拉斯堡举办的阿尔萨斯田园研讨会并发表了演讲。该发言后来以《精神治疗医生与神职人员》(*Psychotherapists or the Clergy*)为题发表。文中，荣格解释说，他给病人治疗的方法是通过体验去支持和陪伴病人——“像是一个启迪的时刻”——“某个他者从黑暗的心灵王国里出现，与他发生冲突”。荣格向他的听众强调，这个时刻意味着“治愈的开始”，即便“这种心理的自发活动常常在内心的声音或幻觉被感受到的时候变得十分强烈”，这种现象被描述为“精神真正的原生的体验”。荣格认为，所谓原生的，其实不是像弗洛伊德所描述的婴儿般的或是问题式的，而是对现代性问题的解决方案。

在差不多同时期的另一篇短文中，荣格比较了他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等其他分析家的观点，他谈到力比多驱动力（弗洛伊德认为是情欲驱动，而阿德勒认为是权力驱动）。荣格认为，力比多驱动力与精神是相冲突的。荣格并没有回避一个事实：即他不能准确地说明精神是什么，但是，很显然，他将其视为一种解放力量，一种逃避他称为“生物体不可阻挡的周期”的方式，或者是，他还生动地将其描述为“与父母肉体联结的纽带，或者是与从我们体内生长出的孩子的肉体联结的纽带”——与过去“乱伦”以及与未来“乱伦”，这都是家庭罗曼史中永远的原罪。荣格用救世主般的语气写道：只有精神才能将我们从这样的桎梏中解救出来，给我们自由，他坚持认为，人们需要“最真实的原生的体验”。他宣称，“我们

这些现代人都需要去重新发现生活：需要重新去体验”，因为“这是打破束缚我们的生物周期魔咒的唯一路径”。

因此，回到“远古”，回到“原生”也是通往未来的一条路径：我们需要去重新发现，用歌德的话来说，“过去与现在融为一体的感觉”是如何将一种新维度呈现在当下的。事实上，在歌德的很多作品中，这种感觉得到体现，“尽管这种感觉是直接被生活所激发或者源于生活本身的”，但它还是让人觉得“怪异”“说不清楚”，甚至“不舒服”。

除了《回忆·梦·思考》这部自传作品之外，关于荣格的生平资料还有其他三个主要来源。

第一，一部分已出版的书信。两卷荣格书信集仍然是不可多得的资料来源，其中一些书信——比如与弗洛伊德的通信（1974年出版），与萨宾娜·斯皮尔林、汉斯·施密特-格森、沃尔夫冈·泡利、埃米尔·梅特纳、尤金·博尔乐、恩斯特·伯恩哈德、维克多·怀特和詹姆斯·基尔施等人的通信——已经成为具有重要思想史价值的经典书信资料，尽管至今这些书信资料并不完整。然而，它们的价值在于让我们看到荣格是如何在书信中向对方阐释他的观点的，无论与之通信者是他的心理分析家同行，还是哲学家、神学家，抑或是普通大众。

第二，有多种版本的荣格传记，其中主要的几本传记都是在过去10年左右的时间里出版的。通过多种传记，可以发现一条轨迹〔关于这些传记的内容与方法的分析，请参阅索努·沙姆达萨尼（Sonu Shamdasani）2005年的研究〕。也许不可避免地，早期的传记在风格和方法上有点像圣徒言行录：就像那些传记的书名所示，在那些传记作家的眼中，荣格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一个特殊的历史文化时期的象征。他们毫不迟疑地将神话般的位置归于荣格，传记中有明显的奉承和含蓄的批评。

然而，回到20世纪70年代，对于荣格的学术评论性研究已经打

下了基础。亨利·F. 埃伦贝格尔（Henri F. Ellenberger）在他所撰写《无意识的发现》（*The Discovery of the Unconscious*）一书中，有一章专门写的是荣格。在沙姆达萨尼看来，这本书具有开创性意义，相当于“荣格研究的分水岭”和“荣格历史作为一个特殊的研究领域的开始”。于是，其他一些具有批评视角和独立思想的传记开始出现，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好几个专业传记作者开始关注荣格，基于布鲁姆（Brome）的传记作品，产生了几本迄今看来仍不完善，但是内容丰富全面的传记书籍。

与此同时，理查德·诺尔（Richard Noll）撰写了一本完全不同的荣格生平与创作——是一本高度批判性的甚至带有些敌意的传记。诺尔是一个门诊心理医生，也是一位科学历史学家，他出版了《荣格狂热》（*The Jung Cult*）和《雅利安基督徒》（*The Aryan Christ*）两本书。诺尔的叙述遭到心理分析师们的拒绝，这完全可以理解，他的一些假设和结论也都受到质疑，但是，他运用历史互文性研究方法，将荣格作品与恩斯特·黑克尔（Ernst Haeckel）的作品和进化生物学相联系，将荣格的作品与巴霍芬（Johann Jakob Bachofen）和奥图·葛罗斯（Otto Gross）作品中的尼采式的母系氏族社会相联系，与斯蒂芬·乔治（Stefan George）等人所提出的文化复兴投射相联系，强调了荣格作为德国文化中的重要思想源泉的深刻和深远的意义。

每一本传记都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圣徒体叙述展现了荣格所拥有的魅力，但是缺少适当的批评视角，在评述荣格的知识成就方面稍显欠缺。那些评论家有时太过仓促，以至于来不及评判，来不及用荣格真正想说的话去评判荣格。最大的问题是，学者们没办法得到《红书》（*The Red Book or Liber Novus*），他们谁也没有读过《红书》。荣格在这本书上花了15年左右的时间，花掉了生命中的数百个小时，

然而，传记作家们却根本不知道这本书里写了些什么。

因此，随着 2009 年学术版《红书》出版，并附有完整的《红书》说明，新的荣格研究时代开始了。由于费利蒙基金会的不断努力，预计人们会得到越来越多的荣格研究的第一手资料。然而，《红书》的出版真的带来了荣格研究的巨变吗？是不是对《红书》寄予了太多的期望？或者我们是否该从别处去寻找新的方向来对荣格进行学术探讨？

除了他的那些书信（主要是迄今为止已出版的）和各个版本的生平传记外，还有第三种资料来源：他的藏书，其中记录了他几十年间阅读的激情。从年轻时代起，荣格就对收藏各类书籍有极大的热情。20世纪 20 年代，他经常做的一个梦表明，图书馆作为知识创新的场所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在这个梦里，墙上的书架上摆满了“大部头的图书”“有的书上带有铜制的陌生人的雕刻”。这些“中世纪古版本和 16 世纪印刷的版本”，上面带有“炼金术的符号”，代表了“荣格人格的一个部分，他的自我的一个方面”。事实上，自他开始研究神学、民谣和宗教起，荣格对集体无意识的概念就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或许可以看作像沙姆达萨尼所说的那样，一种“内在的藏书”。

读书与写作一样，1913 年，荣格以撰写《红书》的形式开始了他非同寻常的藏书计划，书中的主题既包含世界的神话（如吉尔伽美什），也有生活中的一些陈词滥调、生活常识，甚至也有流行文化中的一些垃圾。因此，《红书》的写作让荣格明白了该怎么读书。沙姆达萨尼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荣格的自我实验大都是坐在他的书房里完成的”，这种对于荣格写作方法的认识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因为它实际上揭示了分析心理学作为一种文化投射的意义。

荣格“从古典教育中汲取了营养”，他在《红书》中所编造的个人神话“兼容并蓄，自由地阐发了古代神话中的人物”，但是其中德

国传统仍处于主导地位，特别是，著名的浮士德与查拉图斯特拉——歌德和尼采的代表作品中的人物——最终成为荣格自我的“重要范本”。因为他沉浸在文学中，因而他能够在第二本伟大的专著《心理学类型》(*Psychological Types*)中，讨论了诗歌的类型问题，在他一生的创作中，他一直喜欢探寻文人之间的某种联系，如赫尔曼·黑塞、古斯塔夫·梅里克、托马斯·曼和詹姆斯·乔伊斯等。

1928年，荣格从汉学家理查德·威廉(Richard Wilhelm)那里得到一本复印本的中国古代书籍《金花的秘密》(*The Secret of the Golden Flower*)，这立刻引发了他研究中国古代神谕书籍《易经》以及炼金术的兴趣。受到玛丽·安妮·阿特伍德(Mary Anne Atwood)的著作《探寻炼金术的秘密》(*A Suggestive Inquiry into the Hermetic Mystery*)和伊桑·艾伦·希契科克(Ethan Allen Hitchcock)的《炼金术与炼金术士评价》(*Remarks on Alchemy and the Alchemists*)启发，同时也受到赫伯特·希尔博(Herbert Silberer)和泰奥多尔·弗洛诺伊(Théodore Flournoy)的影响，荣格开始了一场他称为“寻宝”的活动：从古代炼金术文本中摘来的段落写满了8个笔记本(他为此编了索引)。这些有关炼金术的抄写本成为“出色的学术附件”，从中可以衍生出“无数的学术著作”，其中有《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ica*)、《心理学与炼金术》(*Psychology and Alchemy*)、《移情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the Transference*)和《神秘合体》(*Mysterium coniunctionis*)，这些抄写本确实让人了解了很多。从表面上看，这些著作与歌德没有什么共同点，但是我们应该记住，歌德于1768年至1770年间在法兰克福经历了人生的低潮时期，当时，他也是受到了这些作者的启发，如帕拉塞尔苏斯、巴西利厄斯·瓦伦丁(是一位15世纪来自埃尔福特本笃会修士和炼金术士的化名)、格奥尔格·冯·威林、约翰·海尔蒙特、乔治·斯塔基等。